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种解读

陈 雷

内容提要 本文对菲茨杰拉德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盖茨比像菲茨杰拉德笔下的所有主人公一样忠实于“想象中的浪漫”,这种浪漫主义包含有“唯美主义”和“纯真性”这两个层面,菲茨杰拉德为了使盖茨比成为美国梦的象征,有意削减了人物的唯美主义倾向,突出了人物的纯真性,这反而使得人物形象变得单薄了。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叙事方法掩盖了这一弱点。

关键词 盖茨比 “想象中的浪漫” 唯美主义 纯真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所力图探讨的是美国生活的意义这样一个巨大的课题。当然,这一思考是从作家的基本价值观出发进行的。

按照特里林的说法,菲茨杰拉德的所有小说主人公都忠实于“想象中的浪漫”(envisioned romance),^①而且这种浪漫又总是与金钱和成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其早期作品如《人间天堂》中,菲茨杰拉德喜欢给他的金童们罩上一轮浪漫的光环,而且爱用诸如“奢华的”(extravagant and luxurious)、“精雅的”(exquisite)、“敏感的”(delicate)、“迷人的”(glamorous and charming)、“童话般难以置信的”(fabulous)、“深奥微妙的”(sophisticated)之类金光闪闪的词汇来形容这轮光环。这些年轻人陶醉于“慵懒的美”(lazy beauty),个个以“贵族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者”(aristocratic egotist)^②自居,故作谄于世故、洞悉世情的姿态,对万事都报以居高临下的嘲弄。根据这些特点,再连同这些人物对奥斯卡·沃尔

德的热衷(《人间天堂》中的艾莫里多次提及《道林·格雷的肖像》,而《美丽的不幸者》的主人公安东尼则喜欢模仿王尔德小说人物的趣味和举止),我们有理由把菲茨杰拉德的浪漫主义从根源上与唯美主义联系起来。

但菲茨杰拉德毕竟不是王尔德。如果说后者的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浓重的世纪末颓废情调的话,那么前者的人物身上则散发出新兴的美国所特有的天真(即使他们有时也颓废,但看起来总像是对颓废的不大成功的模仿)。唯美主义式的故作姿态不再让人联想起对生活的厌倦和对堕落的赞美,它与年轻人的天真结合在一起。这种纯真化了的唯美主义构成了菲茨杰拉德浪漫主义的核心;反过来说,我们可以从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中分解出唯美主义和天真性这两种因素。两者不可通约,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唯美主义与天真的二元性还与菲茨杰拉德本人阶级意识的双重性相关联。

菲茨杰拉德的外祖父通过经营杂货批发而拥有万贯家财,遗产传到作家母亲手中时也有25万美元之巨,因此他的家族应该说是上层阶级的传统的。但随着他父亲的失业和经商惨败,他们家庭的地位便逐渐陷入了一种暧昧的境地:他们“既非‘贵族’,也不是‘小人物’,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③这种双重性的社会地位培养出一种双重性的阶级意识。菲茨杰拉德有时把自己算作上流社会的一员,陶醉于上层社会的精雅的生活情趣,就像他笔下得志的艾莫里(《人间天堂》的主角)那样自命不凡、得意洋洋;而当艾莫里被富人夺去了心上人,他又会对上层阶级的傲慢和跋扈表示愤愤不平。这个时候他甚至会模模糊糊地鼓吹社会主义,因为一个让最有钱的男人得到最漂亮的姑娘的社会制度使他感到恶心。当然,阶级意识的左右摇摆并不会撼动菲茨杰拉德内心深处对浪漫的信念,但这种浪漫主义中的唯美成分的比重却会受到很大影响:与唯美主义对应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贵族式优越感,而当平民意识占上风时,唯美主义因素便会受到抑制。

当我们从上述角度来考察《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的整体设计时,关于作者创作意图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对浪漫梦想的忠实——表现为赢回过去的恋人——仍是此书的基本母题,但执着于梦想的那个人与菲茨杰拉德前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盖茨比非但不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他甚至被有意地描写为一个自然之子:

他沿着苏比利尔湖南岸奔波,或是捕鲑鱼,或是捞蛤蜊,或是干任何其他为他挣来食宿的杂事。在那些风吹日晒日子里,干着时松时紧的活计,他有着晒得黝黑、越来越棒的身体,过着天然的生活。^④

菲茨杰拉德让自己在感情上所认同的人身处上层社会之外,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他在小说中必然会着意宣泄其对上流社会的不满。但除此之外,作家显然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前面曾

经说过,菲茨杰拉德力图通过盖茨比的故事把握美国生活的本质。既然他已经把个人哲学中的浪漫执着上升到美国梦的高度,那么执着于梦想的这个人当然也应该更具有美国特色。上流社会成员和中产阶级分子要么太欧洲化,要么清教主义气息太重,可以担此使命的只能是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无名之辈”(a nobody from nowhere),一个完全自我设计和自我完成的人,一个像新起的美国那样没有“过去”的人。盖茨比便是按照这个模式创造出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⑤在这句描写中盖茨比与美国形象重合了,菲茨杰拉德把自己所执着的浪漫加以变形(为了符合美国形象,适当的庸俗化是必须的)就成了评论家津津乐道的美国梦。

但要让盖茨比能以菲茨杰拉德典型的浪漫方式来行动,作者还必须合理地解释主人公的个性。前面讲到从菲茨杰拉德式的浪漫中可以分解出唯美主义与天真这两种因素。由于作者希望加强盖茨比这个人物的平民性和美国性,唯美主义因素便不宜突出了。在作品中,菲茨杰拉德也的确有意弱化了这一点。我们看到,虽然盖茨比在海滨购下豪华住宅并举办通宵达旦的盛宴与狂欢,但他本人对这些奢华精致的东西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不喝酒,也不过多地加入谈话,常常只是远远地站在阳台或者台阶上,以一种超然的目光俯视着寻欢作乐的宾客。这与菲茨杰拉德通常的趣味显然是有距离的。读者不妨把小说中对盖茨比的描写同艾德蒙·威尔逊模仿菲茨杰拉德的口吻说的一段话作一番比较:

难道你不觉得当哈里曼和希尔把金子越垒越高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创造性的狂喜吗?想一想吧,你能买任何你想要的……能在一幢豪华的大宅里一连几天举办盛宴和欢会。那里有喝不完的各色好酒,有一支医疗队随时候命,还有城里最大的爵士乐团轮班到这里来吹吹打打。我必须

承认,所有这些用钱堆起来的快乐对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吸引力。^⑥

威尔逊的描写显然更符合菲茨杰拉德本人及其早期作品人物的个性。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那段有名的“真丝衬衫戏”:盖茨比在自己的卧室里不停地把五颜六色的真丝衬衫越堆越高,戴茜看着这个场面喜极而泣。值得注意的是,菲茨杰拉德早期作品《美丽的不幸者》中也有主人公展示他所收藏的豪华睡衣的情节,而这一情节又很可能是对王尔德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中类似情节的模仿。但从后两部作品的相应描写中流露出来的浓厚的唯美主义情趣在盖茨比那里则荡然无存了:他展示衬衫并不是出于自我欣赏,而纯粹是为了吸引戴茜。同样,菲茨杰拉德从尼克的角度极力渲染了盖茨比轿车的豪华,但盖茨比本人对它的评论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这车子很漂亮,是不是,老兄?”

随着作者把一些更符合自己个性的因素从盖茨比的身上削减下去,能够支撑起盖茨比那博大的浪漫的东西就只有天真了。这是菲茨杰拉德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却也是与他的创作思想最为合拍的安排。众所周知,从亨利·詹姆斯开始,天真就被看作美国人性格的基本特点。菲茨杰拉德用天真来解释盖茨比的行为正好和他赋予人物及其梦想以美国特色的意图吻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部小说中,盖茨比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用天真来解释:他天真地相信戴茜不是一个肤浅庸俗的女人,相信渺茫的旧梦能够重圆,相信自己可以按照同一种游戏规则来与有钱人公平竞争。虽然他自己就是社会腐败的一部分(他做违法生意,还很可能是黑帮分子),但盖茨比对周围世界的腐化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无知,这种无知巨大到荒谬的边缘,足以让读者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事实上,盖茨比的形象的确比影子清楚不了多少(这也是门肯对小说的批评)。他在小说中是一个拘束的人,好像一举一动都要看作者的脸色。尽管菲茨杰拉德在使盖茨比的形象能自圆其说方

面已经倾尽全力(当然漏洞也有,比如盖茨比对女人的态度时而是“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时而又变得放肆起来,“他早就跟女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由于女人过分宠爱他,他倒瞧不起她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说明作者一方面想把盖茨比写成一个天真的俗人,另一方面人物又禁不住会流露出其唯美主义者的本色。当然,所有这些矛盾之处并没有严重到完全无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统一,但它们却削弱了盖茨比形象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并使其变得含混模糊),但这个角色却终究只是“扁平人”,他就像一个“裹着头巾的傀儡”那样不能发展,一不小心稍有运动就会“从身子上每个洞孔里往外漏木屑”。这里可以附带谈一谈小说叙述方式的问题。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运用“二元主角”手法是为了故事叙述和道德评判上的客观性,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手法同样也巧妙地掩盖了小说人物形象不明的弱点。就读者针对盖茨比性格的追求,作者可以把问题归结到尼克的视角的有限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菲茨杰拉德把具有个人特色的素材进行组织并通过它对美国生活加以反思的创作意图已经凸显出来。盖茨比、他的天真以及他的梦想都一一地与美国形象、美国性格和美国梦想对应了起来。尽管出于前面提及的原因,他的人物有些平板模糊,但由于作者有效地运用了有限视角的叙述方法,这些缺点并没有伤及作品的整体效果。菲茨杰拉德构思的故事在思想上也站得住脚:盖茨比梦想的破灭不光是由于富人的冷酷自私(这种认识使菲茨杰拉德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他的梦想本身就含有谬误。他从一开始就献身于一种“庸俗的、华而不实的美”,对这种美的献身注定他只会执迷于戴茜这样庸俗的、华而不实的漂亮娃娃,而这种执迷又只能使他的梦想毁灭。也就是说,菲茨杰拉德透过盖茨比这个人物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浪漫主义中本来就有一种毁灭性因素。他曾经说过:“所有进入我头脑的故事便都包含着某种灾祸——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可爱的青年走向毁灭,短篇小说

里的宝石山炸得无影无踪,我的百万富翁也如托马斯·哈代的农民一样,是美丽的,注定遭到厄运的。”^⑦在《美丽的不幸者》中,人物遭难不明不白,理由不充分;在《人间天堂》中,死亡和恶魔则是在事故与幻觉中出现;但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灾难因素与人物的性格却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其紧密度是他早期的小说所无法企及的。然而,承认这些优点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在思想性上的深刻只是相对作家的早期创作而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比较起来严整一些罢了。事实上,这部小说的思想并不是通过人物与环境及事件的互动逐渐揭示出来的,而是在小说的一开始便点得很清楚了。读者在分别看到戴茜和盖茨比的出场后一切就都清楚了——戴茜的庸俗和盖茨比的不现实注定了盖茨比的最后命运(不是指他被枪杀,而是指梦幻的破灭),这对于大家是一目了然的。菲茨杰拉德对盖茨比是这么做的:他先让我们预感到盖茨比的梦想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然后他又让我们看到它真的破灭了。这里没有悬念——既没有情节上的悬念也没有思想上的悬念。由于作者知道他的设计在情节和思想这两方面都不可能超出读者的预期,他便只能要求读者作出情感上的付出了。盖茨比的故事像是被射向夜空的焰火,人们先是赞叹它的绚丽,然后又哀叹它的迅速熄灭。此处作者所做的便是竭尽全力地写出它在熄灭之前令人目眩的美丽,而这种描写正是他最擅长的(这种能力实际上包含在作家那种在高度浪漫的瞬间仍保持清醒头脑的性格特点之中)。于是,在这部菲茨杰拉德投身文学以来创作的最有社会批判意图的小说中,有限的一点社会思想也被感情因素淹没了。

人物形象含混,思想缺乏深度,两者之间少有互动,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小说基本母题——即盖茨比天真地要赢回戴茜重温旧梦——本身的局限性。金童赢回玉女,这正

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经历。头一部小说巨大的商业成功以及此后好几个短篇的连续发表不仅给菲茨杰拉德带来了财富,还奇迹般地帮助他赎回了自己的心上人。他梦寐以求的浪漫瞬间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景,一连串似乎只有在童话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居然成为现实。这种与其生活期待(promise of life)惊人相符的奇迹攫住了作家的想象力,而他也在这一奇迹中为自己的浪漫主义生活观找到了理想的托身之所。然而,这个事件太浪漫、太菲茨杰拉德式了,它妨碍了盖茨比性格的独立展开(因为它需要一个唯美主义的行为者);同时,这个事件的容量太小、太单薄(只适合编一部两幕剧),也没有给情节和思想的发展留下很多余地。《盖茨比》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它作出了什么深刻的社会分析,还不如说它迎合了某种青春式的感伤主义和美国人心底里的自恋情绪。因此,尽管《了不起的盖茨比》得到了考利、特里林和威尔逊的交口称赞,但本文更倾向于门肯的评价:它只是一段“镀了金的轶事”(a glorified anecdote)。

注释:

- ①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Secker & Warburg, 1970), p. 252.
- ② F. Scott Fitzgerald, *This Side of Paradi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26.
- ③ 库普曼:《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年版,74 页。
- ④⑤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译林出版社 1998 年版,85 页。
- ⑥ Frederick J. Hoffman, *The 20s: American Writing in the Postwar Decad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65), p. 135.
- ⑦ 阿瑟·密兹纳:《弗·斯·菲茨杰拉德——“借来的时代”的诗人》,载《世界文学》1980 年第 6 期,191 页。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何 卫